

《管子》導讀

趙善軒

現代人對道德價值的追求日趨淡漠，一些家長生兒育女時就已考慮子女他日的回報，某些父母從小就栽培女兒嫁入豪門，許多學生選科以前途作考慮而忽略個人志趣。套用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·韋伯 (Max Weber) 的術語，這些都是「工具理性」(instrumental reason) 的考慮，即以事件能帶來利益多寡為衡量標準。反之，傳統文化被視為陳義過高，不切實際，原因是我們從小所接觸的傳統文化乃以正統儒家為主，孔子主張「志士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身以成仁」(《論語·衛靈公》)；孟子堅持生與義有矛盾時，「捨生而取義」(《孟子·告子上》)。這種傾向的傳統價值理性思維，在當下社會重視追求利益的風氣下顯得格格不入。

傳統法家思想把效益最大化視為根本的考慮，這近於工具理性主義，惟法家進一步認為只要能達到目的，不惜採取任何手段，為了國家穩定，可以打壓少數人，甚至草菅人命。《商君書》說：「愚者闇於成事，知者見於未萌。民不可與慮始，而可與樂成。」威權管治乃基於人民愚昧之設，古今如一，幾乎沒有一個高教育水平的國家，專政機器能夠長期運作。專政者假設百姓無知，故須由「賢人」領導，稱呼上級為領導人，就是設定了人民需要被領導，而無權參

與政治，政府的透明度亦相當低。《管子》一書載有「賢人」一詞共二十三次，並屢次提到賢人管治的好處，「賢人政治」(philosopher politics)是傳統中國政治文化的核心底蘊，其另一稱呼是「臣屬文化」，即人民樂於臣服於威權者之下，中國千年來皆行此政治思想，而《管子》對這一理論的建構有着不可或缺的貢獻。

近年來，知識界、文藝界仍然不乏人為這種思想重新造勢，試圖製造威權管理的合理性，甚至透過強大的宣傳機器，漸漸成了一種主流聲音。文學、影視作品為這樣的歷史人物塑造偉大的歷史形象，秦始皇、漢武帝不再是杜甫《兵車行》裏的負面人物，而成了一代偉人，清代的雍正皇帝也一改兇殘成性的歷史形象，成了用心良苦的國家領導人，為了社會利益而不計較個人名聲。至於擇善固執又講價值理性的人物，反被人視為不識大體、阻礙了社會發展，例如竟有電視劇把岳飛、文天祥說成妨礙民族融合的障礙。這些人往往重視效果，卻輕視手段，譬如不問子女考試的方法，只關心是否能考出好成績；認為工作性質不重要，能養家糊口即可；不在乎官員如何得居大位，只管其施政的成效是否彰顯。這就是大講「發展就是硬道理」的後遺症，一味發展經濟，而忽略了人文關懷才是人類的核心價值，慢慢地由「向前看」變成「向錢看」，從「為人民服務」變成了「為人民幣服務」。

一、主要思想內容

(一) 義利之辨

歷史學家趙靖指出，先秦諸子如管子、孔子、孟子、荀子等人認可求利是人類之本性。¹《管子·侈靡篇》更明確提出「上侈下靡」的主張，即富人大量消費以造就貧民、工匠、女工的就業機會，有衣食可得。²孔子曰：「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處也。」孔子討論的重點是「義利」之關係，屬於倫理學層面的闡述。《史記·管晏列傳》亦有相類的記述：「管仲既任政相齊，以區區之齊在海濱，通貨積財，富國強兵，與俗同好惡，故其稱曰：上服度，則六親固。四維不張，國乃滅亡。下令如流水之原，令順民心。」其實，《管子》是集各家大成，在義利觀方面比儒家更有彈性，它不像儒家般把道德價值凌駕於生命之上，動輒講「餓死事小，失節事大」或「餓死於首陽山」，而是試圖把傾向價值理性的儒家思想，以及類近於工具理性的法家思想，合而為一，破除非黑即白、二元對立的邏輯謬誤，有意建構成兩者並重的

1 趙靖等：《中國經濟思想通史·卷一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二〇〇二年），第六〇〇頁。

2 巫寶三：《管子經濟思想研究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一九八九年），第一五〇頁。張固也：《管子研究》（山東：齊魯書社，二〇〇六年），第二五一頁。

思考系統。

許多人以為管仲既是現實主義者，故此書多是宣揚唯利是圖的思想。事實上，《管子》絕非只講利益，而是認為道德要在滿足基本需要後進一步實現出來。當代哲學家殷海光提出了人生的意義可分為四個階段，分別是物理層、生物邏輯層、生活文化層和價值層。人類需要拾級而上，充實基本需要後昇華至道德理想的層次，人生才活得有意義。《管子·牧民篇》說：「倉廩實則知禮節，衣食足則知榮辱。」這就是為「義利觀」建立序列，它既注意實質利益，又看重抽象概念，主張先現實後理想，如此不但較符合人性，更是易知易行，這種提倡在滿足生活文化層後，必須發展道德倫理一層的主張，乃由下而上的道德觀，有別於儒家講犧牲小我、完成大我的一套。其實，這種思想正是現代人的明燈，人們既渴望生活安穩，又想為社會出一份力，他們既不喜空談理想，認為過高的目標猶如空中樓閣，但又希望在道德實踐上有一番作為，衣食足而知榮辱似乎是合理的人生目標。順帶一提，法國大革命時西方哲學家孟德斯鳩（Charles de Secondat, Baron de Montesquieu，一六九八—一七五五）也提出相似的說法，世稱「孟德斯鳩命題」，認為當經濟發展起來，擺脫野蠻階段，人們才有能力追求精神上的滿足。³一言蔽之，《管子》所提出的說法是對人性體察極深的洞見。在道德淪喪，幾乎無所不假的

3 白鷺：《貨殖列傳經濟學》（臺灣：海鴿出版，二〇〇九年），第三十至三十一頁。

社會裏，在路見不平拔足而走的當代社會，較容易引起向來不關注道德的人們的反思，提升現代人的德性。

(二) 經濟思想

《管子》一書所提出的治國思想最為可觀，歷代學人多有引用，尤其體現在經濟方面。中國傳統經濟思想有兩大路徑，一是自由放任主義，以黃老思想為代表，司馬遷的「善者因之」⁴是為佼佼者；二是干預主義，具法家色彩的《管子》就是一大濫觴。趙靖指出，《管子》主張國家對經濟行為進行干涉，此方面可見於《管子》之四民不得雜處說⁵。士農工商的階層說在中國歷史上有極大的影響，日本德川幕府亦以為國策，其實《管子》是這方面的首倡者。對此，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在《日知錄》中，有「士何事」條對此進行分析，其謂：

士、農、工、商謂之四民，其說始於《管子》。三代之時，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，升

4 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：「太史公曰：夫神農以前，吾不知已。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，耳目欲極聲色之好，口欲窮芻豢之味，身安逸樂，而心誇矜執能之榮使。俗之漸民久矣，雖戶說以眇論，終不能化。故善者因之，其次利道之，其次教誨之，其次整齊之，最下者與之爭。」

5 《漢書·貨殖傳》：「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。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，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，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，農相與謀稼穡於田野，朝夕從事，不見異物而遷焉。」

之司徒而謂之士。……則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矣，惡有所謂群萃而州之處，四民各自為鄉之法哉。春秋以後，遊士日多。《齊語》言桓公為遊士八十人，奉以車馬衣裘，多其資幣，使周遊四方，以號召天下之賢士，而戰國之君遂以士為輕重，文者為儒，武者為俠。嗚呼！遊士興而先王之法壞矣。

《國語·齊語》亦記載了管仲與桓公的對話：「四民者勿使雜處，雜處則言訕，其事易。」《管子》一書與此條史料大抵相合。管仲本人及《管子》一書都反對四民雜處，此乃出於政府管治的考慮，其認為易於控制各階層，以及堵塞社會流動，實大大有利於社會的「超穩定結構」，而國家穩定是其學說的重中之重。

相反，另一路徑是以司馬遷為首的自由主義，其主張「善者因之」，認為市場放任是最佳的辦法，反對政府直接干預，此與《管子》提出的輕重理論大相徑庭，輕重論提倡由政府設置機構，監管市場經濟。數十年來，中國奉行干預主義，造成了極嚴重的社會問題；西方諸國大講「新自由主義」，最後令各國債臺高築，引發經濟危機。可見物極必反、過猶不及乃千古不易之道理。西漢初年行黃老之術，然漢興七十餘年後因放任不管，導致富者田連阡陌，貧富懸殊，民不聊生。漢武帝時積極改革，卻因與民爭利而令人民生活無依，此即歷史發展的規律。觀乎歷史，當人心思變以後，又會人心思安，在自由主義下生活得太久，人民又渴望轉向社會

主義；反之，社會主義下的人民又希望在自由主義下生活。南美洲近三十年來，就是不斷遊走在左派與右派之間，政權不斷更替，政局長期不穩，就是不明白中國哲學中不偏不倚的道理。

二、作者及成書

眾所周知，《管子》約成書於戰國中晚期，大部分篇章皆非出於管仲之手，而是後人集體編輯而成。部分內容是後人託管仲之名而作，也有一些章節與管仲其人沒有直接關係。據陳鼓應的研究，《管子》一書的部分篇章，是戰國晚期齊國稷下學者的作品，與管仲其人的思想並非完全一致，書中內容很大程度上是屬於道家取向，並且主張道法結合，由老莊的理想主義走入現實社會，對後來的黃老思想有深遠影響。⁶

由此觀之，《管子》是先秦諸子的思想集成，是眾多學者共同書寫的百科全書，涉及治國、

6 陳鼓應：《管子四篇詮釋——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二〇〇九年），第三至二十七頁；參見陳佩君：《先秦道家的心術與主術——以〈老子〉、〈莊子〉、〈管子〉四篇為核心》，第二四五頁。

經濟、軍事、社會、哲學、人口、農業等領域，觸及法、儒、道、農、兵、陰陽諸子學說。

據現有的材料得知，《管子》一書最早被《韓非子·五蠹》提及：「今境內之民皆言治，藏商、管之法者家有之」。《史記》也有詳細記載，此書可能是司馬遷的手邊讀物。到了晉代，學者傅玄對《管子》的作者提出異議，他說：「管仲之書，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為，輕重諸篇尤鄙俗。」傅玄對託名篇章的評價不高，認為是鄙俗之作。唐代孔穎達在《左傳·正義》曰此傳大略云：「世有管子書者，或是後人所錄，其言甚詳……其唯管夷吾乎。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……」可知作者不是管仲。宋代的葉適《水心集》說：「《管子》非一人之筆，亦非一時之書，以其言毛嬙、西施、吳王好劍推之，當是春秋末年。」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說：「今考其文，大抵後人附會多於仲之本書。」當代學者一般認為，書中出現戰國或後代流行的文字，大部分內容非春秋時代的作品，此已成學界共識。⁷

其實，不獨此書，近年出土大量戰國至漢代的竹書、帛書，內容文字與今本流行的大有不同，因我們所讀之版本，多為漢代的改版，多非春秋戰國的原著，故一些學人認為出土文獻使中國哲學史、思想史有改寫的的必要。

今本《管子》與大部分先秦諸子一樣，乃經漢代學者劉向編輯而成。《管子》共八十六篇，

7 張固也：《管子研究》（山東：齊魯書社，二〇〇六年），第二十一至二十二頁。

今本十篇已佚。全書十六萬餘字：《經言》九篇，《外言》八篇，《內言》七篇，《短語》十七篇，《區言》五篇，《雜篇》十篇，《管子解》四篇，《管子輕重》十六篇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將其作為道家一類，而《隋書·經籍志》則將其改列法家一類。其實，這部書包羅萬有，從不同角度，就有不同的看法，故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。

這裏不禁要問，何以後世學者要冒管仲之名而作書呢？主要是因管仲平生乃是實用主義的代表人物，其功業對春秋時代有舉足輕重的作用，世人對他高山仰止，故不少學者都藉管仲之名來發揮，希望建立一套實用主義與道德價值俱備的學說。孔子曾說：「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。」可見就連孔子也肯定了管仲對抗夷狄、使華夏免受夷狄侵害的偉大功績。《論語》中記載了孔子對管仲的人格批評，但孔子也客觀地指出：「桓公九合諸侯，不以兵車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，如其仁。」孔子認同管仲尊王有功，對於維護周室統治權威有着不可磨滅的作用。

司馬遷在《史記·管晏列傳》中說：「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。」認為世人只讚美鮑叔能識別人才，卻少有人認識到管仲的才能。他還說：「管仲世所謂賢臣，然孔子小之。豈以為周道衰微，桓公既賢，而不勉之至王，乃稱霸哉？語曰：將順其美，匡救其惡，故上下能相親也。豈管仲之謂乎？」司馬遷反駁了孔子對管仲的批評，認為他即使有過，也是功大於過。由此可見，對管仲持肯定態度者，乃基於其功業成就，欲以實際作用掩蓋其行事動機，這與西方哲學中的「義務論」凡事以動機作判斷很不同，儒家思想往往以動機作判斷，故近於「義

務論」一類。近百年來，「義務論」被人們視為難以實行的一套，反之「功利論」大行其道，人計算如何將利益最大化，討論社會政策時，目的正義性不再是立論之首要考虑，而成效反是必要條件，這種思維在《管子》一書中大量存在。然此書卻非近於個人功利主義，而是以社會利益為終極追求，這比起現代人講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狀況，又是高一層次。

三國時代的諸葛亮也常自比管仲，諸葛亮也是另一現實主義的代表者，史家多將其置於法家人物之中。他為求達到目的，不計較手段，對付李嚴等蜀國本土派毫不手軟，諸葛亮對管仲的推崇，足見其歷史影響。管仲不像大多數諸子般屬文弱書生，而是戰功顯赫的齊國相國，桓公以仲父尊稱他，他也是經世治國的典範，故後世學者藉他的大名來著書立說，實能大大提升作品的說服力。這是古人與今人之別，古人喜託他人之名著書，今人卻有人把別人的作品強冠自己的名字，可見古代著者志在闡述已見，非為沽名釣譽而寫作。

三、管仲其人

管仲（前七二五—前六四五），名夷吾，字仲，謚號「敬」，史稱管子，潁上（今安徽省